

社交媒体在埃塞俄比亚民族政治发展中的角色及其影响*

李玉洁

内容提要 埃塞民族关系复杂且持续变动。在埃塞媒体管理制度趋严、传统纸媒衰退、媒体极化现象凸显等独特背景下，以脸书、推特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逐步兴起。埃塞的民族政治关系也深受新技术运用的影响，社交媒体为民族“虚拟共同体”形成提供了平台。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也成为埃塞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传播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煽动族际冲突的工具。这既与埃塞的民族、政治、经济状况有关，也与社交媒体的工具属性以及埃塞社交媒体年轻用户的特性有关。社交媒体的“双刃剑”功效塑造了埃塞民族政治中别样的社交媒体使用图景，也给埃塞政府带来一种全新的治理挑战。尽管埃塞政府采取了法律、自律、自建平台等举措以加强对社交媒体的治理，但仍然面临着多重困境。为此，埃塞需从重塑国家认同、重建政府与媒体的良性关系等更为宏大的视野来思考如何更好发挥社交媒体的正向作用。

关键词 社交媒体 埃塞俄比亚 民族政治 民族冲突 媒体治理

作者简介 李玉洁，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素有“民族博物馆”之称的埃塞俄比亚（以下简称“埃塞”）是非洲具有代表性的多民族国家，其因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频繁的民族冲突、独特的民族治理模式吸引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020年11月初埃塞北部提格雷州爆发冲突，持续已一年有余。埃塞主要民族包括阿姆哈拉、奥罗莫、提格雷等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1年度重大招标项目“《非洲通史》（多卷本）”（LSYZD21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都参与其中，导致冲突不断扩大升级，各方都表达出对这个国家“崩溃”与“解体”的担忧。^①当埃塞政府军队和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以下简称“提人阵”）开战之际，第二条战线迅速在网上展开，社交媒体成为新的战场，即埃塞政府及其支持者为一方，提格雷活动家和支持者为另一方，双方都试图控制叙事，以影响国内外舆论。^②社交媒体空间呈现的提格雷冲突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案例，非洲之角的地缘政治、历史创伤、极端民族主义、仇恨言论、虚假信息、平台操纵、鼓动宣传等糅合其中，共同对此次冲突发挥作用，社交媒体作为工具的影响不容忽视。

在社交媒体兴起的背景下，埃塞的民族政治关系也深受影响。新技术成为影响埃塞民族政治的工具变量之一。埃塞作为非洲政治独立的象征，其政治走向与社交媒体治理在非洲具有标志性意义。因此，研究社交媒体在埃塞民族政治的角色及其影响，可为更好地理解非洲国家的民族问题提供新视角。

社交媒体是指允许人们撰写、分享、评价、讨论、相互沟通的网站和技术，是彼此之间用来分享意见、见解、经验和观点的工具和平台，它包括博客及微博客、图片分享博客与视频分享、论坛、社交网络和网络社区等具体形态。^③近年来，各类社交媒体的出现和发展使得民族关系研究的媒体生态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有关社交媒体与民族认同、民族文化、民族政治等方面关系研究备受学界关注。在学者们的视野中，社交媒体对民族关系的影响通常存在两种表述系统之中。一方面，作为网络技术乌托邦话语的延续，学者积极肯定社交媒体带来的传播赋权，认为它对民族认同形成、民族政治参与、民族治理等提供了更多空间。^④另一方面，学者也并非都对社交媒体强化民族认同、改变现实的民族政治图景抱有期望，不乏对社交媒体构建民族认同

① Alexander Rondos, “Africa: Ethiopia Is Tearing Itself Apart”, *Chatham House*, <https://www.chathamhouse.org/publications/the-world-today/2021-12/africa-ethiopia-tearing-itself-apart>, 2021-12-03.

② Liam Scott, “How Social Media Became a Battleground in the Tigray Conflict”, *VOA*, <https://www.voanews.com/a/how-social-media-became-a-battleground-in-the-tigray-conflict-6272834.html>, 2021-12-04.

③ 曹博林：《社交媒体：概念、发展历程、特征与未来》，载《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第65~69页。

④ 谭天：《社交媒体给少数民族带来的发展机遇》，载《新闻论坛》2017年第6期，第51~54页；陈静静、庄晓东：《文化认同与少数民族电子网络媒介》，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87~92页；黄少华：《网络空间的族群化》，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88~93页。

“神奇力量”的质疑与批判之声。^①

从既往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交媒体在民族政治关系的形成中潜藏着两种力量：一种是正向的力量，它为不同民族提供了新的交流平台，发挥着民族凝聚和身份认同的重要黏合剂作用，从而推动不同民族乃至社会的整合；另一种则是负向的力量，社交媒体上的去中心化、匿名化的信息交换使得族内成员比以往更加孤立，网络言论更是走向极化，从而导致现实民族关系愈发分裂。两种力量的并存与相互作用的张力，使社交媒体在作用于民族政治的发展前景方面充满变数。而社交媒体对埃塞民族政治的影响就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

一 社交媒体在埃塞兴起的背景

自20世纪90年代起，旅居海外的埃塞侨民就开始使用社交媒体，主要是通过博客方式参与埃塞国内的政治讨论，而当时这些博客创建者主要是埃塞政府的“持不同政见者”。^②新世纪之交，海外埃塞侨民主要是北美侨民在创建埃塞最早的一批网络社区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创建了“埃塞俄比亚评论”（The Ethiopian Review）、“那日里特”（Nazret）与“埃塞媒体”（Ethiomeia）等知名网站，以用来广泛讨论政治议题，其观点高度政治化。^③在埃塞国内，以青年记者为代表的新一代开始拥抱新技术以推动政治革新，但他们在网络上发表的言论已不再那么激化。为了提升影响力，这些言论还被印刷在纸质媒体上或者制成小册子，得以在整个埃塞广泛传播。^④到2005年底，政治和准政治类的参与式网站平台已达到57个，政治类博客也蓬勃发展。如果说2005年前博客是代表埃塞海外侨民的独特现象，那么2005年埃

^① 陈静静：《互联网与少数在民族多位文化认同的建构——以云南少数民族网络媒介为例》，载《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2期，第13~17页；安琪：《移动社交时代涉及民族因素群体性事件舆情危机管理难题与破解》，载《沧州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第109~112页；黄少华：《网络空间的族群化》，第88~93页。

^② Abiye Megenta, *The Internet's Democratization Effect in Authoritarianisms with Adjectives: The Case of Ethiopian Participatory Media*, Reuters Institute Fellowship Paper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0, pp. 26-27.

^③ Iginio Gagliardone et al., *Mechachal: Online Debates and Elections in Ethiopia - From Hate Speech to Engagement in Social Media*, London: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6, p. 28.

^④ Terje Skjerdal, "Journalists or Activists? Self-identity in the Ethiopian Diaspora Online Community", *Journalism*, Vol. 12, No. 6, 2011, pp. 1-16.

塞大选则标志着博客在本土的兴起，乌拉尔（Urael）、埃西·扎戈尔（Ethio Zagol）、迪娜（Dina）等一批博主在博客空间撰写有关埃塞政治的第一手报道和深度分析，显示了早期参与式新闻的重要影响。^① 也是在2005年前后，手机的短消息功能被广泛运用，以响应网上论坛发出的各种行动倡议，极大地发挥了及时传播信息和动员群众的功能。之后，反对党和一些激进人士开始频繁使用社交媒体作为对抗政府的工具。而仅在这场大选之后一年，埃塞政府就开始阻止那些发表不同政治意见的博客和网络论坛，由此拉开了埃塞政府与几代数字化激进人士之间复杂而漫长的博弈序幕，后者期待使用社交媒体以推动政治革新，由此埃塞社交媒体治理的困境也开始显现。^②

随着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因其传播快、成本低、互动强等优势已超过各类传统媒体成为埃塞民众喜欢的获取政治信息、参与民族事务的主要媒介。以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为代表的社交网络平台是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人们广泛使用这类社交媒体以获取有关埃塞政治和其他领域的信息。^③ 埃塞民众对脸书等社交媒体的信任度较高，早在2014年的一项调查中，大多数的埃塞人已经将脸书看作是媒体，并且32.5%的受访者将其看作是喜欢的媒体渠道，甚至超过了电视（21.5%）、广播（17%）与报纸（6.1%）。^④ 社交媒体在埃塞的兴起有着独特的背景。

（一）趋严的媒体管理制度

1995年实施的埃塞宪法第29条是管理媒体与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纲领性法条，它规定公民拥有不受政府干扰的言论自由，同时也赋予大众媒体与新闻界不受审查提供信息给公民的自由权利。^⑤ 除了宪法之外，1992年的《传媒法案》和1999年的《广播法案》也再次保障了公民和媒体新闻自由的权利。

① Abiye Megenta, *The Internet's Democratization Effect in Authoritarianisms with Adjectives: The Case of Ethiopian Participatory Media*, pp. 29 - 30.

② Iginio Gagliardone and Matti Pohjonen, "Engaging in Polarized Society: Social Media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in Ethiopia", in Bruce Mutsvairo, *Digital Activism in the Social Media Era: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Emerging Trends in Sub-Saharan Africa*,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 27 - 28.

③ Abreham Getachew and Tibebe Beshah,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in Citiz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FIP WG 8.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nsfer and Diffusion of IT, Accra, Ghana, June 21 - 22, 2019, pp. 487 - 496.

④ Sileshie S. Kumlach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Facebook as Media Platform in Ethiopia", *Journa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Vol. 6, No. 7, 2014, pp. 99 - 110.

⑤ Tracy Ross, "A Test of Democracy: Ethiopia's Mass Media and Freedom of Information Proclamation", *Penn State Law Review*, Vol. 114, No. 3, 2010, pp. 1 047 - 1 066.

利,但这两个方案更加细致,包含了诸多媒体管理的内容。1992年颁布的《传媒法案》主要针对纸质媒体,强调新闻出版自由在埃塞受到认可与尊重,禁止对新闻业进行新闻审查与类似性质的任何限制。该法案的第六条和第七条对报刊的注册要求与执照申请做了详细规定,将所有报刊的活动都纳入注册范畴之中。该法案的第十条则对报道内容进行了规定,要求媒体有责任确保其传播内容不会引发任何刑事或民事责任,不存在任何反对国家或威胁当局安全的刑事犯罪内容,不包含任何针对个体、国家、民族或机构的诽谤或虚假内容,不包含任何煽动民族对立、民族矛盾或民族战争的言论。媒体报道的内容如违反上述条款,对责任人则处以不少于一年但不超过三年的监禁或5 000~10 000比尔(约合1 000~2 000美元)的罚款或两者并罚。^①该法案出台后,埃塞的非政府机构、个人都可以创办纸质媒体,因此20世纪90年代埃塞涌现大量新的报刊。据埃塞官方数据,在1992年10月至1997年7月间,共有385种出版物注册,其中包括报纸265种、杂志120种。^②民营报刊在这一时期获得了空前发展。

1999年出台的《广播法案》主要针对广播电视,该法案指出:“非政府机构、个人可以经授权、发放执照等方式来创办商业电台和电视台”,并规定当时的埃塞广播局作为独立的政府机构负责广播台与电视台的注册审核与执照颁发。该法令的第27条对广播电视台播放的内容进行了限制,其内容同《传媒法案》对纸质媒体的要求有类似之处,而第42条也规定了对违法行为的监禁或罚款措施。^③

整体来看,一方面,埃塞的媒体管理制度较为严格。报纸、广播、电台等媒体的创办都要申请注册,获得政府颁发的执照才能运营,而媒体的报道内容也被纳入管理之中,违反规定者会遭到处罚。2005年埃塞全国大选以来,埃塞政府又出台一系列媒体管理的法律和规定,如2008年的《大众媒体自由和获取信息法案》、2009年的《反恐怖主义法》等,媒体的报道空间更是被压缩收紧。另一方面,埃塞的传统媒体大都处于政府的管控之下。政府拥有

^① Global Campaign for Free Expression,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Ethiopia”, <https://www.refworld.org/pdfid/4753d3b00.pdf>, 2021-05-14.

^② Terje S. Skjerdal, “Uneven Performances by the Private Press in Ethiopia: An Analysis of 18 Years of Press Freedo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 Language Arts*, Vol. 3, No. 1, 2009, pp. 44-57.

^③ Global Campaign for Free Expression,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Ethiopia”.

全国 1/3 的广播电视媒体，埃塞通讯社（ENA）、埃塞广播公司（EBC）等官方媒体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最主要来源。虽然近年来埃塞政府逐步发放了少数私营媒体的牌照，私营媒体获得了一定的发展，法纳（Fana）广播、卡纳（Kana）电视等私营媒体以节目的创新内容赢得了民众的喜爱，但这些私营媒体较为脆弱，生存空间仍然相对狭窄。因此，埃塞社交媒体兴起的背景之一正是在严格的传媒管理制度之下，政府管理着官方媒体，私营媒体较少，埃塞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十分有限，只能寻找其他替代性的媒介，获取信息较为便利、及时且互动性强的社交媒体就成为他们的最佳选择。^①

（二）纸质媒体衰落推动媒体融合转型

埃塞社交媒体的兴起不是一个孤立现象，而是全球新旧媒介形态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埃塞的报纸衰亡、社交媒体兴起明显滞后于其他发达国家，但全球媒介态势的演变对社交媒体在埃塞的兴起仍具有重要的催化作用。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和手机媒体在全球的不断普及和发展，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通信技术为依托的社交媒体发展迅猛，改变了全球传媒格局。在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情势下，全球范围内的纸媒衰落加快，社交媒体取代电视成为青年人的主要新闻来源，传统的新闻机构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平台来产生流量，媒体融合成为传统媒体破解生存危机之路。与纸媒衰落形成反差的是，社交媒体用户极速增长。截至 2021 年 10 月，全球人口数量为 78.9 亿，其中社交媒体用户达到 45.5 亿，占世界总人口的 57.6%，这一数字比 2020 年同期高出 4 亿多，相当于同比增长近 10%。社交媒体用户平均每天在社交媒体上耗时 2 小时 27 分，2021 年全球社交媒体用户花费的总时间将超过 3.7 万亿小时。^②

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近年来埃塞纸质媒体也呈现快速衰落的态势，纸质媒体的融合转型之路成为必然，这是埃塞社交媒体兴起的另一重要背景。埃塞的报业处于快速萎缩之中，一些政府与政党报纸停办。据统计，埃塞每千人拥有报纸仅为 4.65 份，降至历史新低。到 2019 年底，埃塞私营报纸和杂志只有 20 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发行的报纸和杂志也只有 23 种，这与

^① Alemayehu G. M, “Cartoon Democracy: Ethiopia’s 2010 Ele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opian Studies*, Vol. 5, No. 2, 2010, pp. 27 - 51.

^② Dataportal, “Digital 2021 October Global Statshot Report”, <https://dataportal.com/reports/digital-2021-october-global-statshot>, 2021 - 12 - 05.

20世纪90年代鼎盛时期的五年注册出版物逼近400种已无可比性。^①以埃塞通讯社出版的四份官方报纸为例,包括两份埃塞最早的日报,分别为1941年创办的《亚的斯泽门》(Addis Zemen)与1943年创办的《埃塞俄比亚先驱报》(The Ethiopian Herald),前者为阿姆哈拉语报纸,后者为英语报纸,发行量分别约为15000份与9000份,这两份报纸的主要阅读对象为政府公务人士。另外两份报纸是《贝瑞萨》(Barissa)与《世界》(Al-Alem),两者都是周报,分别以奥罗莫语与阿拉伯语出版,每份报纸的发行量都不超过500份。^②可见,埃塞纸质媒体的发行量很小,对埃塞民众的影响力也较为有限,仅存的纸质媒体要发挥影响,利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媒介融合遂成为趋势。当前,埃塞主要的报纸都创建了脸书与推特等社交媒体账号,改变了传统的报纸新闻编辑模式,积极调整自身以适应社交媒体的特性。^③在埃塞纸质媒体更多将社交媒体作为自己的信息出口通道时,埃塞民众放弃纸质媒体,转向依赖社交媒体就成为一种自然选择。

(三) 民族问题导致媒体极化态势严重

埃塞的民族多样性特点突出,埃塞共有85个民族,其中第一大民族为奥罗莫族,人口占比为34.4%;第二大民族为阿姆哈拉族,人口占比为27%;其他主要的民族包括索马里族(6.2%)、提格雷族(6.1%)、锡达莫族(4%)、古拉格族(2.5%)、沃莱塔族(2.3%)、阿法尔族(1.7%)等等。^④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埃塞各民族逐渐形成了单一民族聚居区和多民族交错居住的区域。1995年的埃塞宪法正式确立民族联邦制,全国根据不同民族聚居情况划分为9个州和2个自治行政区。各民族均有权自治,各州享有立法、行政和司法自治权。除了在联邦机构享有代表席位,各民族还有权无条件退出联邦。这一制度理论上为减少民族冲突、维系国家稳定奠定了基础。

^① Mulatu Alemayehu Moges, "Rapid Assessment of Ethiopian Media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https://en.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rapid_assessment_of_ethiopian_media_during_the_transition_period.pdf, 2021-05-16.

^② Markos Berhanu, "The Fading Press", <https://www.ethiosports.com/2017/05/13/the-fading-press>, 2021-05-14.

^③ Jeslyn Lemke and Endalk Chala, "Tweeting democracy: An Ethnographic Content Analysis of Social Media Use in the Differing Politics of Senegal and Ethiopia's Newspapers", *Journal of African Media Studies*, Vol. 8, No. 2, 2016, pp. 167-185.

^④ World Population Review, "Ethiopia Population 2020 (Live)", <https://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untries/ethiopia-population>, 2021-05-17.

但实际上，民族联邦制自实施以来便饱受争议，旨在确立民族平等的民族联邦制进一步强化了本民族的身份认同和政治身份，政治分野越发以民族身份为基础，反而加剧了民族矛盾，尤其是民族混居地区的民族冲突。近年来，人们对这一制度的失望与日俱增，认为其不仅没有赋予任何有意义的自主权，还滋生了不平等，引发了民族间的紧张和暴力。^①自2015年起，埃塞的社会、民族矛盾开始集中爆发，多地连续发生示威游行和骚乱。而2018年阿比·艾哈迈德·阿里（Abiy Ahmed Ali）就任埃塞总理后推行的快速、激进的改革造成了新的紧张局势，政局的周期性动荡加剧。

埃塞这种民族分化与民族冲突的现实直接塑造了媒体图景，社交媒体也是迎合了这一媒体图景应运而生。民族归属与身份政治成为当前埃塞媒体话语的主要框架，记者倾向于从与其民族背景相符的方式来报道新闻、界定问题，加剧了埃塞媒体的极化趋势。除了民族问题外，逐步放开的媒体私有化、埃塞媒体惯用的西方“言论自由”价值取向，以及政治选举等都是媒体极化的推手。这种极化体现在两个方面的叠加：一方面表现为媒体的民族极化，当前埃塞媒体大都是按照民族来划分的。民族因素实际上一直是埃塞新闻业永远存在的暗流，不同民族的媒体与记者都倾向于使用支持自己民族与意识形态的信息来源，拒绝使用其他民族的信源进行平衡报道，可以说远离了新闻媒体的专业主义精神和职业道德。^②另一方面表现为埃塞官方媒体与私营媒体的两极分化，这两者长期处于互不信任的状态。私营媒体通常认为官方媒体是政府的传声筒，其报道宣传色彩浓厚，而官方媒体对私营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其结果是：针对同一事件，官方媒体与私营媒体的媒体报道立场与基调相差甚远，两极分化态势严重。正如一些埃塞学者所言：“查看埃塞不同媒体的报道内容，会发现在一个国家里竟然有如此多的‘国家’，有时候会怀疑我们是否身处同一个国家”。^③埃塞媒体的极化态势产生了比预期更加深刻的影响，这种带有民族冲突和身份政治的报道进入民众的视野，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埃塞民众的态度取向，一些埃塞民众心理存在“自己听到的不是真的”这样

^① Rashid Abdi, “Ethiopia: The Fracturing of the Oromo Elite and Return of Ethiopia’s Law and Order State”, *AllAfrica*, <https://allafrica.com/stories/202008130640.html>, 2021-05-20.

^② Benon Herbert Oluka, “How Ethiopian News Media Have Become Dangerously Divided along Ethnic Fault Lines”,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risj-review/how-ethiopian-news-media-have-become-dangerously-divided-along-ethnic-fault-lines>, 2021-05-21.

^③ Ibid.

一种基本预设。因此，能接入互联网的民众更愿意相信，基于社交媒体平台的自由特性，自己能获取到更真实客观的信息，进而通过意见表达参与民族政治事务。埃塞新闻界的两极分化态势无疑成为社交媒体迅速发展的助推器，也奠定了埃塞社交媒体上事实与意见不分、各类极端言论混杂、两极分化的底色。

二 埃塞社交媒体使用中的民族政治因素

民族政治是多民族国家中的一种基本而重要的政治关系，包括族际政治关系、民族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两个主要方面。在埃塞这样的多民族国家，社交媒体已经在各个民族得到广泛使用，成为他们推动民族整合与国家认同、抑或制造族际冲突与民族国家关系紧张的重要推手，埃塞社交媒体使用中的民族政治因素得以显现。

（一）各族青年是社交媒体使用的主力群体

在互联网与社交媒体使用方面，埃塞是一个充满“矛盾感”的国家，如极低的互联网渗透率与严格的互联网监管举措、落后的经济发展与活跃的社交媒体使用频率等。据世界银行数据，2020年埃塞人均收入为936.34美元，属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①截至2020年底，在埃塞总计约1.179亿人口中，网民人数约为2115万，互联网渗透率为17.9%，而非洲平均的互联网渗透率为43%。^②虽然埃塞的互联网渗透率在非洲处于较低水平，但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其青年人对社交媒体的活跃使用度。脸书是埃塞年轻人使用最多的社交媒体。截至2021年10月，埃塞脸书用户已达776.6万，占其总人口的6.6%，其中男性占比65.7%，女性占比34.3%，25~34岁的青年人是使用脸书最多的群体，达到410万人，其次是18~24岁的青年人。^③可见，埃塞青年人是社交媒体使用的主力军。埃塞年龄中位数为17.9岁，平均年龄十分年轻。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埃塞青年人将接入互联网，埃

^① The World Bank, "GDP Per Capita (Current US \$) - Ethiopia",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CD?locations=ET>, 2021-05-22.

^② Internet World Stats, "Internet Penetration in Africa", <https://www.internetworldstats.com/stats1.htm>, 2021-05-22.

^③ NapoleonCat, "Facebook Users in Ethiopia", <https://napoleoncat.com/stats/facebook-users-in-ethiopia/2021/10>, 2021-10-31.

塞互联网渗透率与社交媒体用户数量都将继续处于快速增长态势。

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引入了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所谓“现代性”“先进性”价值观，与埃塞当下的经济和民生现实形成巨大反差。加之埃塞已有的媒体信息渠道不太畅通，政府对媒体的管理较严，从而引发了埃塞民众特别是各族青年人与青年组织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激荡。与祖辈相比，在新技术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埃塞青年人受教育水平更高，通过社交媒体赋予自身权力以改变僵化现状的意愿也更加强烈。因此，他们对于民族政治事务热情高涨，在参与民族政治事务的深度和水平等各方面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塑造了埃塞政治历史中的一个新景象，深刻地影响了埃塞传统的政治格局。^① 比如，奥罗莫族激进青年组织“奎罗”（Qeerroo）和阿姆哈拉族激进青年组织“法诺”（Fano）等纷纷成立，这些青年组织利用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参与政治事务，表达诉求，鼓动民众抗议，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动员能力，已经成为影响埃塞政府在决策时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二）西方社交媒体成为埃塞青年参与民族政治的重要工具

据统计公司（Statcounter）2021年10月数据，埃塞的主要社交媒体及其占比分别为：脸书 64.36%、推特 15.45%、优兔（YouTube）10.33%、拼趣（Pinterest）6.86%、照片墙（Instagram）1.88%、汤博乐（Tumblr）0.43%。^② 可见，埃塞的社交媒体市场全部由西方国家所垄断，没有任何一家本土或者非西方国家的社交媒体在此领域占据重要份额。2018年有学者在埃塞6所大学随机选取了400名大学生调查使用脸书线上参与政治的情况，所有受访者都称他们会使用脸书去获取信息，其中69%的人会频繁地使用脸书去获取政治信息，约31%的人有时会使用脸书去获取政治信息；在问及受访者最倾向采用来自何种信源的政治信息时，有41.3%的人称他们会选择脸书，同样也有41.3%的人称会选择美国广播公司、埃塞卫星电视、奥罗米亚媒体网络等在海外运营的媒体。^③

^① Adamu M. Assefa, “Role of Social Media in Ethiopia’s Recent Political Transition”, *Journa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Vol. 12, No. 2, 2020, pp. 13–22.

^② Statcounter, “Social Media Stats Ethiopia”, <https://gs.statcounter.com/social-media-stats/all/Ethiopia>, 2021-11-01.

^③ Ketemaw Muluye, “Youths’ 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Ethiopia; A Study of Students’ Facebook Usage in Some Selected Public Universities”, *Advanced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Vol. 5, No. 1, 2019, pp. 10–17.

埃塞青年人的信息源获取偏好，也为各方势力利用新技术手段实施政治动员提供了便利，特别是对于海外侨民来说，西方社交媒体已成为他们组织、动员埃塞青年政治参与的重要工具，成效突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埃塞裔美国人贾瓦尔·穆哈迈德（Jawar Mohammed），他出生于奥罗莫族家庭，很早就意识到了电视、社交媒体在政治动员中的作用。2013年，他就在美国创办了奥罗米亚媒体网络，将该媒体描述为“一个独立的、无党派的、非营利的新闻企业，其主要职能是制作关于埃塞最大和人口最多的奥罗米亚州的原创和公民驱动的报道”，其民族定位清晰。贾瓦尔在网上有着大量的追随者，拥有超过160万的脸书粉丝和超过20万的推特粉丝，奥罗米亚媒体网络的脸书粉丝也超过200万。他被称之为奥罗莫族激进青年组织“奎罗”的创建者，其将社交媒体与“奎罗”结合起来，在埃塞国内产生出一种新型的社会动员方式，即利用社交媒体发起和组织广泛的消费抵抗、民众抗议、居家罢工、游行示威，并将海外的埃塞侨民联合起来，扩大为跨国的抵抗运动。贾瓦尔利用其社交媒体以及奥罗米亚媒体网络的影响力，对埃塞政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在美国曾利用社交媒体动员了广泛的奥罗莫人抗议活动，远程扮演了暴力抗议的“带头人”和奥罗莫青年的“麦克风”角色，后来阿姆哈拉族的抗议者也加入了抗议，由此成为埃塞前任总理辞职、助力阿比上台的推力之一。^① 贾瓦尔在埃塞总理阿比上台后不久回到埃塞，又转而效忠反对派，注册成为反对党奥罗莫联邦党（Oromo Federalist Congress）成员，还放弃他的美国公民身份，以便有资格参加埃塞选举。他利用自己的媒体资源及其在奥罗莫青年人中的影响力对政府施压，成为了阿比总理的强大对手。许多奥罗莫青年人将贾瓦尔视为英雄，称他带来了他们为之奋斗的政治变革。贾瓦尔作为埃塞“网络大人物”成功的秘诀正是利用了埃塞最大的族群奥罗莫青年人不甘居于“第二”的心理，提倡“奥罗莫第一”的意识形态，由此社交媒体也就成了扩大民族分歧的工具。

（三）社交媒体的民族政治言论伴随着非理性表达且呈现复杂化态势

埃塞长期的民族冲突和政治不稳定使社交媒体成为传播虚假信息、错误

^① “‘We Won’: A Divisive Activist’s Role in Remaking Ethiopia”, *France 24*, <https://www.france24.com/en/20180908-we-won-divisive-activists-role-remaking-ethiopia>, 2021-05-25.

信息、谣言、极端言论、仇恨言论的沃土，特别是在重大突发事件爆发时，各类未经核实的虚假信息和极端言论被广泛传播，从而形成了社交媒体空间的复杂舆论场。例如，2020年6月奥罗莫族歌手恰恰卢·洪德萨（Hachalu Hundessa）被枪杀身亡后，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各种虚假信息和投机观点，如有的帖文认为此事件是出于民族动机的政治暗杀，是由埃塞政府或埃塞民族主义者策划的，^①因为恰恰卢的歌曲主要表达了奥罗莫族作为第一大族群长期被边缘化的情感。奥罗莫政客、激进民族主义者贾瓦尔等则通过社交媒体发动煽动性的消息，社交媒体用户的发文充满了民族主义情绪，纷纷指责阿姆哈拉族。阿比总理也在脸书发文，称他正在等待恰恰卢遇害事件的调查报告，并呼吁各方保持冷静，防止发生更多的犯罪。但在社交媒体的煽动下，线下暴力升级，很快居住在奥罗米亚州的200多名无辜的阿姆哈拉人惨遭不幸，非奥罗莫人拥有的企业被洗劫一空，商店被纵火焚烧。最终，埃塞政府强迫断网，海外的奥罗莫族激进分子继续抗议，成为为西方和国际观众塑造叙事的掌舵人。

恰恰卢遇害事件只是观测埃塞社交媒体民族政治言论呈现非理性态势的一个案例，更多煽动民族矛盾的仇恨言论、极端言论充斥社交媒体空间，特别是在重大事件发生之际。一些研究分析了2015年埃塞大选时脸书上的13000条推文，指出民族已成为各种煽动性言论的最主要攻击目标，其中75%的仇恨言论、58%的挑衅言论都有特定的民族攻击对象，而92%的危险言论都是匿名发表的，内容基本上全都是关于民族问题。^②另有研究者对分别代表阿姆哈拉族、奥罗莫族和提格雷族的三家媒体在脸书和优兔开设账号下的评论进行分析，在共计8525条用户评论中，有33.24%为仇恨言论，而在这些仇恨言论中有32%是针对民族问题的，其中对阿姆哈拉族的攻击最为激烈。^③

^① Newsbreezer, “Africans Are in Favor of Digital Media but Are Aware of the Disadvantages”, <https://newsbreezer.com/kenya/africans-are-in-favor-of-digital-media-but-are-aware-of-the-disadvantages>, 2021-05-26.

^② Iginio Gagliardone. et al., *Mechachal: Online Debates and Elections in Ethiopia - From Hate Speech to Engagement in Social Media*, London: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6, p. 7.

^③ Muluken A. Chekol, Mulatu A. Moges and Biset A. Nigatu, “Social Media Hate Speech in the Walk of Ethiopian Political Reform: Analysis of Hate Speech Prevalence, Severity, and Nature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https://www.tandfonline.com/action/showCitFormats?doi=10.1080/1369118X.2021.1942955>, 2021-05-27.

(四) 政治势力利用社交媒体操纵舆论的现象凸显

埃塞在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上的用户呈快速增长态势，各利益相关者都认识到了社交媒体在参与政治事务与社会动员中的威力，不同政治派别采取各种手段利用社交媒体来操纵有关民族政治的言论，这种现象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2020年11月爆发的提格雷冲突就是最好写照。冲突爆发后，埃塞政府及其支持者、提格雷活动家和支持者这两方的社交媒体之战也立即拉响，双方主要采用了以下手段来操纵舆论。

第一，创建大量新账号。虽然2020年11月4日提格雷地区的互联网和电话服务被切断，而讨论这次冲突的推特新账号却在之后大量出现。据统计，2020年11月1~10日推特上关于讨论提格雷冲突和阿比总理的相关推文，30%都是来自2020年新创建的账号，其中将近一半推文来自10月底和11月初创建的新账号，特别是11月4日提格雷冲突爆发后，新创建的账号数量迅速增长，每天平均从21个增长到245个，而这些账号都是一边倒地持反政府立场，因此有学者认为，大量账号创建背后是有组织的操纵行为。^①

第二，推广主题标签活动，采用“复制+粘贴”方式来操控流量。提格雷支持者最具代表性的是创办于2020年11月6日的“支持提格雷”(Stand With Tigray)网站，它自称是非盈利性的数字化组织，主要是为了应对埃塞政府军、厄立特里亚军队和阿姆哈拉族武装民兵对埃塞最北部地区提格雷人发动的不公正战争和种族灭绝。^②该网站创立之后，就利用社交媒体的主题标签功能，创建和推广“停止提格雷战争”(#StopTheWarOnTigray)、“提格雷种族灭绝”(#TigrayGenocide)、“与提格雷在一起”(#IStandWithTigray)、“提格雷信息公开”(#OpenTigray)等主题标签，在推特和脸书实施大规模的“复制+粘贴”行动。主题标签功能在于只需在推文中的相关关键字或短语之前使用“#”符号，就可以链接到趋势事件的任何其他文本。而从11月下旬开始，亲埃塞政府的账号也开始在推特上推广主题标签，它们主要宣传阿比总理一直追求的埃塞“团结”概念，因此主要推广的主题标签活动为“埃塞团结”(#UnityForEthiopia)、“埃塞必胜”(#EthiopiaPrevails)、“提人阵是罪魁祸首

^① Claire Wilmot, “Ethiopia’s Cracking down in Tigray. But Activists Are Spreading the News”,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0/11/17/ethiopia-s-cracking-down-tigray-activists-are-spreading-news>, 2020-12-05.

^② “Stand With Tigray”, <https://www.standwithtigray.com>, 2021-12-05.

首”（#TPLFisTheCause）。社交媒体上敌对的两派不仅言论上针锋相对，还发动用户向社交媒体平台举报对方的账户，控诉对方实施平台操纵，由此推特被迫采取措施，暂停了参与“复制+粘贴”以及大规模发文的相关账户。^①

第三，利用虚假信息及事实核查机制来攻击对方。在提格雷冲突断电后形成的信息真空中，对立双方都利用社交媒体大肆宣传虚假、未经证实或误导性的信息，以达到指控对方、揭露对方“暴行”的目的，而这无疑更容易激化民族冲突。比如，提格雷派在脸书上发布了有关提格雷地区所谓“阿克苏姆（Axum）大屠杀”的照片，指责埃塞政府军队；而亲政府的社交媒体账号则通过在谷歌上进行反向图像搜索，证实这张虚假新闻照片拍摄于2020年11月的尼日利亚。两派就此议题的交锋十分激烈，仅在2021年2月下旬的一天，双方分别使用“阿克苏姆大屠杀”（#AxumMassacre）和“虚假的阿克苏姆大屠杀”（#FakeAxumMassacre）的推文量分别约9万条和1.2万条。^②阿克苏姆事件成为双方相互攻击诋毁、煽动民族仇恨的工具。此外，关于提格雷冲突的战况进展、伤亡情况、武器装备等信息，埃塞政府军队与提格雷军队都注重使用社交媒体发布信息，但双方的说辞往往大相径庭，导致外界无法获知真实战况，“双方言论均难以证实”成为国际媒体报道的必备注释。针对社交媒体上泛滥的虚假信息，埃塞政府在脸书和推特上开设了“国家紧急事实核查”（State of Emergency Fact Check）的账户，后在2021年6月底其单方面宣布停火后，又改名为“埃塞当前事实核查”（Ethiopia Current Issues Fact Check），以发布政府声明和冲突进展的消息，并对媒体的错误报道和激进言论进行纠正，由此对提人阵虚假信息的指控就成为埃塞政府官方通讯的一个核心特征。从理论上讲，这一事实核查机制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其客观性备受各方质疑。^③

实际上，社交媒体存在隐形的言论控制早已不是新鲜事，在网络这一特

① Claire Wilmot, Ellen Tveteraas and Alexi Drew, “Dueling Information Campaigns: The War Over the Narrative in Tigray”, *The Media Manipulation Case Book*, September 14, 2021.

② Zecharis Zelalem, “Tigray Conflict Sparks A War of Fake Tweets and Intense Propaganda”, *The Global and Mail*, <https://www.theglobeandmail.com/world/article-tigray-conflict-sparks-a-war-of-fake-tweets-and-false-propaganda>, 2021-12-06.

③ Liam Scott, “How Social Media Became a Battleground in the Tigray Conflict”, *VOA*, <https://www.voanews.com/a/how-social-media-became-a-battleground-in-the-tigray-conflict-6272834.html>, 2021-12-07.

殊的场域中，族性、围观、群体压力、仇恨等交织在一起，很容易衍生出对异己意见的排斥，而这种排斥又很容易被一些机构或者利益集团利用，从而使社交媒体成为操控舆论的工具。尽管提格雷冲突中社交媒体上对立争锋的两派都声称自己秉持客观中立，没有政治倾向性，但各自的民族政治倾向则事实存在。

三 社交媒体对埃塞民族政治的影响

无论是埃塞各民族政治精英利用社交媒体来宣传、组织、动员与行动，还是普通民众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其政治取向与诉求，均推动着埃塞民族政治的演化，体现为社交媒体对埃塞民族政治的双重影响力。

（一）社交媒体塑造“虚拟共同体”且增强族内认同与国家认同

社交媒体的出现，为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平台和条件，能够帮助各民族人民建立起一种云端之上的密切、团结、可靠的群体关系，发挥民族内部黏合剂的重要作用。而基于互联网为基础的网络虚拟空间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的共同体可称为“虚拟共同体”，这个虚拟共同体是在不断发展的技术基础设施之上出现的，如脸书、博客、微博等社交媒体都是虚拟共同体。^①在社交媒体搭建的虚拟空间中，一个民族的族内成员可以在文本、图像等互动的基础之上建立起跨地域的互动，从而维系该民族的集体记忆，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与凝聚民族认同，确立“我族”与“他族”的界限，不断强化自身的民族身份。

社交媒体推动了埃塞各民族“虚拟共同体”的形成，形塑了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新场域，并极大地拓展了各民族社会行为的时空跨度。在日常生活中，借由社交媒体平台，各民族的族内成员实现了跨地域、跨宗教、跨阶层的联合，加深了对民族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重建了有关埃塞各民族的民族想象。特别是对处于政治和经济边缘化地位的奥罗莫族、锡达莫族等族更是尤为重要，包括阿比总理上台后实施政治改革被边缘化的提格雷族，社交媒体帮助他们超越地域、经济与政治的区隔，进而在重大事务中，他们能够利

^① 张媛、刘子怡：《国外民族共同体认同研究现状与前沿转向——基于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的分析》，载《世界民族》2021年第5期，第129~142页。

用社交媒体进行社会动员、传递信息以影响政府决策，从而提升了本民族在政治格局中的话语权。诚如贾瓦尔所言，针对奥罗莫人长期以来一直被处于边缘化状态，他看到了机会，通过卫星和社交媒体从海外向埃塞传播信息，谴责不公正，强调奥罗莫人的历史，并鼓励年轻的奥罗莫人为自己的文化感到自豪，这是他称之为“建立集体自尊的项目”。^①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政治整合，增强了对埃塞的国家认同。“整合”即部分结合为整体，而“政治整合”指代社交媒体通过信息公开传播、塑造对话场域、民意舆情监测、社会主体互动等传播机制，调整、协调、整合公众的政治价值、政治认知、政治心理、政治共识等，使之形成统一、均衡、有序的政治共同体的过程。^② 比如，在2017~2018年间，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脸书群组（OroMar）创立，它是奥罗莫（Oromo）与阿姆哈拉（Amhara）两个族名的合成词。这个群组加强了两个民族之间的联合与信息互通，特别是加强“奎罗”和“法诺”互动，以在行动上保持一致。这个脸书群组创建后，后来又有大量类似的联合账号和主页在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开设，关注者众多，政治活跃分子与青年人都在上面分享与讨论，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两个民族之间的现实矛盾。此外，社交媒体也为来自埃塞不同地区、不同生活环境的青年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交流平台，推动了他们将“埃塞人”当作第一认同的形成。例如，大部分埃塞青年人都支持阿比总理的新政，“我们支持”“我们联合起来”“我们与你在在一起”“同一种爱，同一个埃塞”等各种展示团结的标语、符号在社交媒体上颇为引人注目。^③ 特别是阿比提出的“协同合一”（Medemer）的理念，呼吁国内各族人民保持团结，推崇埃塞至上主义，这个标语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得到广泛传播，绝大多数使用社交媒体的人都知道这个理念，甚至很多用户都将个人资料图片也改成了不同形式的“协同合一”字样。脸书和推特上还开设了“协同合一”的账号，分别有约2.3万和0.7万的关注者，专门宣介阿

^① NPR, “How an Exiled Activist in Minnesota Helped Spur Big Political Changes in Ethiopia”, <https://www.npr.org/2018/12/06/672196480/how-an-exiled-activist-in-minnesota-helped-spur-big-political-changes-in-ethiopi>, 2021-05-29.

^② 张爱军、吉璇：《正与负：社交媒体政治传播功能的平衡与优化》，载《行政论坛》2021年第5期，第20~29页。

^③ Adamu M. Assefa, “Role of Social Media in Ethiopia’s Recent Political Transition”, *Journa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Vol. 12, No. 2, 2020, pp. 13-22.

比总理有关这一理念的新书及相关活动。可以说,在社交媒体的助力下,越来越多的埃塞民众开始认识到自己作为“埃塞人”身份,这有助于消除民族隔阂,推动埃塞的国家认同形成,助力埃塞政府推行各项改革。

(二) 社交媒体加剧极端民族主义话语泛滥乃至激化现实的民族冲突

基于各自政治取向的异同,并非所有埃塞人都认同“协同和一”这一理念。一些反对党将其视为一种营销工具,认为其缺乏解决埃塞紧迫问题的具体方案,因为宗教和民族暴力仍在继续。^①对众多生活在首都之外的埃塞人来说,他们对自己的民族有着强烈的归属感,认为本民族应有权在不受任何外部干预的情况下决定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使用本民族语言接受教育,虽然他们希望属于内涵更广泛的埃塞国家,但更希望保留自己独特的身份和特征。^②这种强调某个特定民族的血缘、人种、语言、传统与文化的观念被称为族裔民族主义,人们通常认为其意味着排他、偏狭与封闭,是社会冲突的重要根源。^③而在过去的30年里,族裔民族主义占据了埃塞的政治中心,成为塑造这个国家政治生活最重要的单一原则,也成为埃塞政治动员的主要模式。^④

社交媒体的出现就为族裔民族主义的表达与宣泄提供了渠道,也为其政治动员提供了重要平台。民族身份与国家身份的博弈映射到网络空间,可以发现社交媒体上埃塞族际关系的缓和只是短暂的“蜜月期”,对“埃塞人”的些许国家认同也仅限于不影响自己的民族身份和利益的前提之下。因而,社交媒体在调和埃塞族际认同乃至国家认同的作用是有限的。在埃塞民族问题日趋复杂、各方政治诉求和利益难以协调,以及所谓的“国民暴力传统”等现实因素影响下,社交媒体上民族分歧与对峙话语占据主导,极端民族主

^① Maria Gerth - Niculescu, “Can PM Abiy Ahmed Bridge Ethiopia’s Ethnic Divide?”, *DW*, <https://www.dw.com/en/can-pm-abiy-ahmed-bridge-ethiopia-ethnic-divide/a-51877108>, 2020-05-30.

^② Awol Allo, “Why Abiy Ahmed’s Prosperity Party could be Bad News for Ethiopia”, *Aljazeera*, <https://www.aljazeera.com/opinions/2019/12/5/why-abiy-ahmeds-prosperity-party-could-be-bad-news-for-ethiopia>, 2021-05-30.

^③ 戴晓东:《浅析族裔民族主义与公民民族主义》,载《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2期,第57~60页。

^④ Awol Allo, “Why Abiy Ahmed’s Prosperity Party could be Bad News for Ethiopia”, *Aljazeera*, <https://www.aljazeera.com/opinions/2019/12/5/why-abiy-ahmeds-prosperity-party-could-be-bad-news-for-ethiopia>, 2021-05-30.

义话语泛滥，这也导致社交媒体对埃塞民族政治的负面影响更为凸显。族裔民族主义者操纵社交媒体，传播极端民族主义与仇恨言论，扩大了民族冲突和民族矛盾，从而对埃塞的国家认同形成了巨大障碍。因此，社交媒体对埃塞民族政治产生的负面影响值得高度关注，以至于阿比总理2019年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就曾提出社交媒体正在煽动民族仇恨与分裂，破坏了埃塞的政治转型。^①

在重大事件中，社交媒体已成为各方向埃塞政府施压的工具，由此扩大了现实的民族冲突，引发政局动荡。2014~2017年间的“奥罗莫族大抗议”就是初显社交媒体威力的一个典型案例。2014年爆发的“奥罗莫族大抗议”从土地问题开始，后扩大到要求州自治、争取语言和文化权利、反对种族歧视等多个领域。奥罗莫族抗议者特别是青年学生与联邦警察和安全部队发生暴力冲突，导致多人死亡。抗议者们使用脸书、推特、网站、博客等各类社交媒体分享文件、图片、视频、音频和文字资料，动员民众上街示威抗议，而在抗议现场的民众则用上述手段第一时间“直播”政府军队和安全部队与平民在街头的对抗实况。^②埃塞民众拍摄的许多视频在社交媒体广泛扩散，一些视频和图片还显示了警察对抗议者实施殴打、实弹以及死伤人员的残忍画面。^③与此同时，埃塞海外侨民也利用社交媒体向国际社会展示这次大抗议，抨击政府的镇压行为，并发起请愿、捐款等多项活动以声援埃塞国内的抗议。^④“奥罗莫族大抗议”在国内外的共同作用下愈演愈烈，埃塞政府宣布于2016年10月实施为期6个月的国家紧急状态，并公布《国家紧急状态实施细则》，以控制紧张局势。在“奥罗莫族大抗议”中，尽管社交媒体使用受限，但这是第一次在埃塞最大的奥罗米亚州使用社交媒体来传递信息与协同抗议

① Abdi L. Dahir, “Nobel Peace Laureate Says Social Media Sows Hate in Ethiopia”,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19/12/10/world/africa/nobel-peace-abiy-ahmed.html>, 2021-05-31.

② Hammurabi Dugo, “Violence Against Free Media and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in Ethiopia: An Analysis of Mechanisms of Restrictions on Information Flow”, *Africology: The Journal of Pan African Studies*, Vol. 9, No. 10, 2016, pp. 395-410.

③ Endalkachew Chala, “Ethiopia Protest Videos Show State Brutality, Despite Tech Barriers”, *Global Voices*, <https://globalvoices.org/2016/01/06/ethiopia-protest-videos-show-state-brutality-despite-tech-barriers>, 2021-06-01.

④ Madebo A, “Social Media, the Diaspora, and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in Ethiopia”, <http://democracyinafrica.org/social-media-the-diaspora-and-the-politics-of-ethnicity-in-ethiopia>, 2021-06-01.

行动,从街头到屏幕对埃塞政局发展颇具影响力。自此之后,社交媒体在埃塞民族政治动乱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运用,其利用的深度和广度完全可以比肩社交媒体资源丰富的发达国家。

整体而言,在埃塞这种高度异质性与存在多种竞争性民族认同的语境下,社交媒体对埃塞民族政治关系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社交媒体吸引埃塞青年人参与政治、建构政治话语、赋权之前被边缘化的民族而影响国家政策、增强各民族内部与族际间的政治与文化合力,从而短期内会加深埃塞民众的国家认同。而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上也充斥着谣言和假新闻,仇恨言论与民族激化言论盛行,扩大了现实中的民族冲突,消解了同为埃塞人的国家认同,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①可以说,从长期看,社交媒体在埃塞民族政治中正煽动着极端民族主义并破坏着其所依赖的联邦制度的基础,会减少族外群体的整体性政治参与,扩大民族矛盾,从而形成分裂的埃塞民众。社交媒体在埃塞民族政治中同时发挥着正向整合与负面消解的双向作用,但负面影响远超正面影响,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值得关注。

第一,从根源上来说,社交媒体平台埃塞各民族的言论交锋与冲突对峙是其现实民族关系的映射,这与埃塞的民族状况及历史、政治、经济等因素密切相关。正如有埃塞学者所言,将社交媒体的影响视为埃塞冲突的唯一因素无疑是简单化和短视的,这是因为目前埃塞的冲突根源来自于多年来困扰这个国家的结构性政治问题,即埃塞失效的部落联邦制是使国家四分五裂的原罪。^②确实如此,从历史来看,民族问题在埃塞有很深的渊源。早在孟尼利克二世时期埃塞已经基本建立起了现代意义政治疆域的统一帝国,并且依靠武力和专制逐步完成了以阿姆哈拉文化为主体的历史和文化建构,而这使得第一大民族奥罗莫族与其他民族包括提格雷族、锡达莫族、索马里族等长期遭受阿姆哈拉族所谓的“内殖民化”统治,由此民族矛盾和冲突从未停歇。^③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实行民族联邦制,为埃塞提供了一套折中的国

① Mukerrem Miftah, “Ethiopia in Transition is Facing Critical Challenges”, *Addis Standard*, <https://addisstandard.com/oped-ethiopia-in-transition-and-critical-challenges>, 2021-05-28.

② Rehobot Ayalew and Solomon Yimer, “Does Social Media Intensify the Conflict in Northern Ethiopia?”, *Addis Zeybe*, <https://addiszeybe.com/featured/politics/currentaffairs/analysis/does-social-media-intensify-the-conflict-in-northern-ethiopia>, 2021-06-02.

③ 施琳、牛忠光:《埃塞俄比亚民族关系与民族治理研究》,载《西亚非洲》2013年第4期,第19~34页。

家政府组建方案，但民族与选举政治的简单结合使得这个问题无法得到根本解决。而阿比总理上台后推行改革，解散了由提人阵、阿姆哈拉民族民主运动、奥罗莫人民民主组织和南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阵线这四个民族党派共同组建的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创建新的泛埃塞政党“繁荣党”之时，打破以往由民族塑造的政治格局，遭到了提人阵的强烈反对。繁荣党由除了提人阵之外的前三个成员合并而成，提人阵认为自己遭受政治排挤被边缘化，遂“退群”，由此两党矛盾不断加剧，直到兵戎相见。提格雷冲突的爆发，其实质正是长年在北部拥兵自重且曾作为核心政党执政埃塞 20 余年的提人阵，不满政治权力遭到中央剥夺而爆发的战争，也是中央集权的国家民族主义主张与分权式地区自治主张的矛盾。只有理解埃塞的民族政治制度及其矛盾，才能探寻埃塞社交媒体上民族言论两极分化、仇恨言论充斥的根源。

第二，从社交媒体的工具属性来看，其固有的匿名性、隐蔽性、互动性、及时性、共享性、圈层化等特征容易滋生谣言和极端言论，特别是在遭遇不同民族身份和民族情感的民族共同体时，民族意识就会得到空间强化与高涨，进而演化成各种极端表达与激烈对抗。由于身体不在场和匿名，导致网络互动只能建立起一种暂时的、缺乏真情实感交流的、充满言语冲突和怒火的、无责任感的社会关系，无法期望社交媒体所搭建的网络空间能够产生正常的人际关系，网络空间只不过是一个游戏性、挑战日常社会规范的虚拟场域而已。^①正是在这种虚拟空间里，埃塞的青年人紧紧抓住社交媒体，利用其工具属性，在尽情的展演和宣示中体现其自我的民族身份认同，创造了一种狂欢式的、非理性的“参与文化”。

第三，从社交媒体的用户构成来看，埃塞青年本身的特性也助长了社交媒体负面功效的发挥。一方面，在埃塞严重的政治、社会和民族危机中，青年人参与政治已变得司空见惯，一些人对政府无法实现经济重建、制定更进步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妥善解决民族冲突等成效表示失望，认为政府没有倾听他们的意见，感到自身被忽视。^②相对于其父辈，埃塞青年人似乎更加勇

^① 黄少华：《网络空间中的族群认同：一个分析架构》，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卷，第245~252页。

^② Chatham House, “Why Do Young People Feel Ignored by Politicians? Insights from the Common Futures Conversations Survey”, <https://medium.com/chatham-house/why-dont-young-people-feel-listened-to-by-politicians-a35e475498df>, 2021-06-03.

敢、有胆量来解决根深蒂固的民族问题，青年人已经表明他们积极参与政治的强烈愿望，而如何发挥影响力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在传统媒体长期处于政府的严格管理下，社交媒体这一公共空间的突然开放，为埃塞青年参与政治事务的讨论、维护自身的民族传统和身份认知提供了绝佳的平台。而社交媒体的责任成本过低，又缺乏“把关人”，导致这个场域中的分享和讨论容易受到情绪的诱导，转化成情绪性的语言，情绪宣泄变得更加肆意，从而使得社交媒体逐渐成为一个由情绪主导的公共讨论空间。另一方面，埃塞社交媒体用户缺乏适当自律性，无法形成一个自控性的网络空间。有埃塞学者指出，当前埃塞的社交媒体用户还缺乏辨别自己转发信息是否真实、是否合理的能力，并且也缺乏一种维护理性网络空间的责任感。^①这种媒介素养的缺乏导致其无法甄别各类信息，也无法学会在匿名的网络空间里适度自控与自我管理，导致了社交媒体场域里的信息杂糅和群体极化现象。因此，需要辩证来看埃塞社交媒体上的这些极端民族主义言论，其代表的仅是一些埃塞青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的观点，且这些观点深受西方主流媒体、国际组织等外部言论的影响，并被社交媒体这一工具“放大”，并不能代表所有埃塞民众对民族问题的看法和认知。

四 埃塞政府对社交媒体的治理及其面临的困境

对于埃塞政府来说，社交媒体的正负影响复杂交织在一起，为其带来一种全新的治理体验。为了更好发挥社交媒体之“善”，消除其“恶”，埃塞政府采取了有力举措加强对社交媒体的治理，但效果有限，且面临着多重困境。

（一）埃塞政府加强对社交媒体治理的举措

第一，制定社交媒体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2020年3月，埃塞政府颁布了《仇恨言论和虚假信息预防和抑制法案》（Hate Speech and Disinformation Prevention and Suppression Proclamation），以解决长期困扰该国的仇恨言论和虚假信息问题。该法案虽然也针对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但更多内容指向社交媒体，规定禁止个人在社交媒体上传播和散布谣言与仇恨言论，违

^① Kibrom Berhane, “Media Literacy and Facebook Use in Ethiopia”, *The Reporter*, <https://www.thereporterethiopia.com/article/media-literacy-and-facebook-use-ethiopia>, 2021-06-03.

者将判处最高五年的监禁与最高 10 万比尔（约合 2 861 美元）的罚款。与此同时，该法案规定了社交媒体平台的各种责任：包括社交媒体服务的提供商应努力避免在其平台上出现虚假信息 and 仇恨言论，以及在被告知后的 24 小时内需要删除此类信息。此外，该法案还规定了向公众提供社交媒体服务的提供商是否违规的报告等内容。^① 这项法案出台后褒贬不一，有反对者认为其违背了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称其是埃塞政府压制反对派的法律手段，政府可依据该法实施任意逮捕，加剧民族紧张局势，并可能进一步助长暴力行为。^②

除《仇恨言论和虚假信息预防和抑制法案》外，在埃塞现有法律中，涉及社交媒体、互联网管理的法律主要还有以下两个：一是 2016 年的《计算机犯罪法》，其中规定在网络煽动恐惧、暴力、混乱或人与人之间冲突的内容将被处以最高三年的监禁。^③ 二是 2021 年 4 月埃塞正式通过的新的《媒体法》，这一法律在修正已有的《大众媒体自由和信息获取法案》与《广播法案》基础上出台，旨在囊括以前不受监管且增长迅速的互联网媒体市场。该法案成立了专门的埃塞媒体管理局（The Ethiopian Media Authority），负责整个国家的媒体管理，这一机构实际上由之前的埃塞广播局改名而来。新的《媒体法》明确将社交媒体定义为媒体的一种，将支持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联系起来，规定埃塞公民拥有创办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的自由，但网络媒体必须以与传统媒体同样的方式向埃塞媒体管理局申请注册，获得许可后才能营业，否则将被处以罚款或暂停业务，并规定其发布的音频、视频等信息档案，保存期限需要达到 6 个月。^④ 此外，这一法案还强调了媒体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以及禁止传播和散步仇恨言论、媒体的权利和义务等内容。^⑤

第二，提升新闻界和民众的自律意识与媒介素养。除了通过强制的法律

① “Hate Speech and Disinformation Prevention and Suppression Proclamation”, <https://chilot.me/wp-content/uploads/2020/04/HATE-SPEECH-AND-DISINFORMATION-PREVENTION-AND-SUPPRESSION-PROCLAMATION.pdf>, 2021-06-05.

② Aljazeera, “Ethiopia Passes Controversial Law Curbing ‘Hate Speech’”,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0/2/13/ethiopia-passes-controversial-law-curbing-hate-speech>, 2021-06-05.

③ “Computer Crime Proclamation”, <https://www.ilo.org/dyn/natlex/docs/ELECTRONIC/103967/126636/F1922468791/ETH103967.pdf>, 2021-06-06.

④ “Media Proclamation”, <https://chilot.me/wp-content/uploads/2021/04/Media-Proclamation-No.-1238-2021.pdf>, 2021-06-05.

⑤ “Ethiopia’s New Media Law Opens Sector for Investment and Self-Regulation”, <https://mersamedia.org/ethiopia-s-new-media-law-opens-sector-for-investment-and-self-regulation/>, 2021-06-06.

手段加强对埃塞社交媒体的规制以外，近年来埃塞政府还注重软性管理，希望通过一系列的记者培训和倡议行动提升新闻界和民众的自律意识和媒介素养。例如，《仇恨言论和虚假信息预防和抑制法案》要求埃塞有关政府部门开展提升民众甄别虚假信息的意识和媒介素养的活动，并要求埃塞人权委员会（EHRC）开展提升民众甄别仇恨言论的意识相关活动^①，以官方之力来倡导与提升民众的媒介素养，从而达到减少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在网络空间扩散的目的。此外，埃塞新出台的《媒体法》也尤为重视媒体和用户的自律与自我监管，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在言及这一内容。这一法案的出台也激励了埃塞媒体从业人员、学术界、法律专家和其他相关者，他们都期待自下而上加强埃塞媒体的自律建设，建立起独立的自我监管机构并使其顺利运作，以减少报道中的意识形态和民族偏见，以更负责任的媒体形象来提供准确的信息与公正的分析，进而促进政府、不同媒体、不同民族之间的和平共处。^② 如果新出台的埃塞《媒体法》能引发埃塞新闻业的一场自我革命，通过建设埃塞新闻行业的自律平台，提升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势必对社交媒体的管理发挥正向作用。

第三，加紧建设埃塞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在埃塞频繁的政治动乱与民族冲突中，政府意识到建设讨论国内公共事务社交平台的重要性，由此加大“国产”社交媒体的建设力度，希望能掌握舆论的自主权和主导权，避免出现意识形态领域的真空或混乱。在2021年6月21日埃塞议会选举前一周，脸书宣布因违反其“虚假的协同行为”规则，删除了一批埃塞针对国内用户的“虚假账号”。脸书认为这些账号与埃塞信息安全局（Information Network Security Agency）有关，账号主要以阿姆哈拉语发布阿比总理及其领导的繁荣党相关的新闻，以及对政见不同人士和其他政党如奥罗莫解放阵线、埃塞民主党和提人阵的批评性言论。^③ 埃塞信息安全局局长舒梅特·吉扎（Shumete Gizaw）指责脸书删除这些账号和帖子的行为，称埃塞即将推出自己

① “Hate Speech and Disinformation Prevention and Suppression Proclamation”.

② Mersamedia, “Ethiopia’s New Media Law Opens Sector for Investment and Self - Regulation”, <https://mersamedia.org/ethiopia-s-new-media-law-opens-sector-for-investment-and-self-regulation>, 2021-06-07.

③ Elizabeth Culliford, “Facebook Says It Removed Fake Ethiopia Account Network ahead of Election”,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technology/facebook-removes-what-it-says-is-fake-ethiopia-account-network-ahead-election-2021-06-16>, 2021-06-18.

的社交媒体平台，目前正在测试中，以取代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他表示政府此举是希望能够减少外国科技公司对该国政治的干涉，并称埃塞拥有开发平台的本地专业人才，不会聘请外部人员提供帮助。^① 虽然埃塞本土的社交媒体还未正式推出，但能窥见政府为了改变西方国家社交媒体独占市场、本土社交媒体平台缺失这一局面的努力。

（二）埃塞社交媒体治理面临的困境

尽管埃塞在社交媒体的管理上，采取了法律、自律、平台自建等举措，对规范社交媒体用户的行为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仍面临着多重困境。

第一，国家法律与媒体自律都还有待完善与提升。依法管理社交媒体目前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虽然埃塞的一些法律涉及对社交媒体的管理和规制，但已有法律、法规的实用性、操作性和指向性还不够强，甚至很多时候这些法律被看作是对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限制。因此，埃塞社交媒体的法律还需要不断完善，在参考各国经验的基础上，从埃塞实际出发出台专门的互联网或社交媒体管理法案，实现建规立制与依法管理，这将是埃塞政府突破社交媒体治理困境的重要路径。与此同时，与法律并重的媒体自律性也应加强。当前，埃塞新闻界和民众的自律意识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互联网行业组织也较少，新闻行业组织也各自为阵，虽然政府出台系列措施鼓励提升用户的自律意识和媒介素养，但仍然停留在倡导层面，绝大多数社交媒体用户的信息甄别能力与自控能力还很弱，甚至处于“无意识”状态，而传统媒体为主的新闻界还在适应这个充满新变革、新技术的世界，新闻从业人员对于自身角色的转换思考与能力建设也将是埃塞社交媒体治理上的重要一环。

第二，社交媒体监管方法与尺度还需要优化。埃塞政府支持、鼓励社交媒体行业的发展，希望能够利用其技术优势，发挥其在对内社会治理、对外沟通交流中的作用。但社交媒体的诸多特性又要求政府必须进行监管，监管的方法与尺度就尤为关键。埃塞政府社交媒体治理面临的另一困境正来自于此。一方面，其监管的方法较为单一，主要是通过法律惩处使用者（包括网络博主、社交媒体用户、网络记者编辑等）、封锁互联网、屏蔽社交媒体平台

^① Victor Oluwole, “Ethiopia is Building Its Ow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o Rival Facebook, Twitter, WhatsApp”, *Business Insider Africa*, <https://africa.businessinsider.com/local/markets/ethiopia-is-building-its-own-social-media-platforms-to-rival-facebook-twitter/v7dclfk>, 2021-06-12.

等措施执行监管，容易导致埃塞民意的反弹，无法达到有效管理社交媒体的目的。另一方面，政府对社交监管的尺度也常受诟病，特别是在遭遇突发事件或者大范围的社会不稳定状态之时，“一刀切”的断网举措成了当局平息动乱和激进民族主义言论的常用工具。据统计，在2019年，埃塞共发生274小时的互联网中断。^①这种断网既包括全国性的，也包括地区性的。在一般情况下，埃塞政府在应对国家安全、平息抗议、管控示威活动等问题时，都会采取切断互联网的举措。在危机和紧急情况下，获得可信的信息是至关重要的，而断网之举只会加剧国内民众和埃塞海外侨民的焦虑情绪及对信息研判的混乱态势，损害他们对政府的信任，还会招致国际社会对埃塞限制言论自由、危害人权的批评之声。对于埃塞政府来说，断网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抗议示威等此类危机，其更需要的是建立起有效、可持续、富有弹性的监管体制，而不是遇到危机事件就断网。

第三，政府对平台的合理限制与内容审查还需要更加科学。埃塞社交媒体治理的另一困境来自于内容审核，由于埃塞民众使用的都是西方社交媒体，因此埃塞政府无法对这些内容进行有效审核，而在社交媒体平台的自我审核较为缺乏的情况下，就会造成把关方缺位的现象。以脸书为例，2019年其在非洲开设了第一家内容审核中心，承诺雇佣100名第三方外包员工来负责整个非洲市场，但事实上这项工作进展如何，脸书是否有专门指派人员来应对埃塞的仇恨言论传播问题不得而知。虽然脸书公司表示，其已经在埃塞投入了两年多的安全措施，拥有了检测以阿姆哈拉语、奥罗莫语、索马里语和提格雷尼亚语发布的仇恨和煽动性内容的能力，但它并未公布雇用了多少人来审查每种语言的内容。研究社交媒体的埃塞学者则认为，脸书上的大部分内容都未经检查，甚至存在放任仇恨言论滋长现象。^②虽然埃塞的民族冲突问题已经持续多年，很难将脸书这一类社交媒体平台看作是这一切问题的罪魁祸首，但它确实为仇恨情绪的传播推波助澜。因此，对于脸书这一类在埃塞处于垄断和霸权地位的社交媒体，对其权力进行合理限制、要求其建立有效的

^① Isobel A. Hamilton, “Ethiopia Shut down the Entire Country’s Internet after the Assassination of A Popular Singer”, *Business Insider South Africa*,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za/ethiopias-internet-totally-cut-off-following-killing-haacaaluu-hundeessaa-2020-7>, 2021-06-12.

^② Peter Mwai, “Ethiopia’s Tigray Conflict: What Are Facebook and Twitter Doing about Hate Speech?”, *BBC*, <https://www.bbc.com/news/59251942>, 2021-12-06.

法规加强内容审核，以及政府尝试建立独立的社交媒体内容审核与监控中心，防止族际间的社交媒体武器化，都应是埃塞社交媒体治理突破困境需要考量的内容。

五 结语

观察社交媒体在埃塞民族政治关系的使用新图景和双重影响，我们可以发现：各种复杂的因素共同作用于埃塞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形成。虽然社交媒体助长了虚假信息、仇恨言论与极端民族主义话语的泛滥，但是在行动者的理性选择之下，社交媒体的负面功效会得到部分消解。因此，各方行动者包括政府、新闻界、企业应行动起来，不但要从法律、自律、监管、审核等方面加强对社交媒体的管理和规制，更要从更宏大视野、更多维层面来思考如何更好地发挥社交媒体的正向作用。

第一，重塑埃塞的国家认同，发挥社交媒体在普遍性议程中的作用。当前，埃塞社交媒体上出现的乱象正是埃塞现实中民族关系紧张、民族与国家冲突不可调和的线上写照，因此跳出社交媒体的“技术决定论”，从更广的埃塞社会视角来关照此问题就成为突破点。其中，重塑埃塞的国家认同应成为当务之急。认同具有可变性，是可以根据环境和需要建构和再造的。据此，埃塞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也是可变的，这为通过对话解决埃塞民族冲突提供了理论基础。强化“我族”“敌族”认同会造成对立，而弱化各族关于“族内”“族外”认同会有利于国家认同的增强。在这个过程中，要发挥社交媒体在认同调控中的积极作用，塑造出一种更和平、更团结的新认同，使得原本充满敌意的民族走向和解与联合。通过社交媒体设置更具普遍性的议程应是重塑埃塞国家认同的一个机会，如前文提到阿比总理提出“协同和一”理念之初，就受到了脸书上来自埃塞不同民族的社交媒体用户支持，因为这代表着埃塞通过改革追求政治自主性的尝试，有利于整合埃塞国内碎片化的政治、经济格局，促进埃塞政治、经济的一体化，符合各族的共同愿望。因此，社交媒体更应设置这一类具有普遍性的议程，进而让理性的动员者与文化精英合理领航，使得整个网络空间更加有序。

第二，从根本上解决埃塞新闻业存在的问题，重建媒体与政府的良性关系。埃塞社交媒体的负面功效被放大，在很大程度上与长期以来埃塞新闻业

存在的问题紧密相关,包括新闻业不发达、传媒市场经济规模小、媒体管理制度不够完善、新闻行业整体缺乏自律精神、私营媒体与政府关系紧张、媒体极化严重,等等。埃塞私营媒体从一开始就普遍存在制度的缺失和对职业道德标准的无视,从这些私营报刊的报道中很难找到完全符合新闻基本标准的故事,新闻内容的高度社论化和炮轰式的新闻标题成了当时的风气。^①加之,这些私营媒体缺乏记者协会、新闻职业道德等方面的规制与自律,与官方媒体各自为阵,最后只能靠埃塞政府严格的媒体管理制度来实施监管,从而导致埃塞的新闻自由受损,也让埃塞民众无法获得客观、中立、平和的信息。因此,埃塞应考虑从宏观上加强对整个新闻业的规制,重塑新闻业遵守职业规范的良好风气,重建民众对官方媒体和私营媒体的信任,让这些媒体发挥引导网络舆论、正本清源的作用,从而逐步改变社交媒体空间极端民族主义话语、仇恨言论、煽动性言论等泛滥的局面,这也许才是治本之策。

第三,利用大数据技术,对社交媒体进行常态化“柔性”监管,尽早地识别谣言并抑制谣言传播。与其在重大事件发生之时运用法律武器逮捕和监禁制造网络谣言的使用者,或者频繁采用断网之手段,不如将监管与治理社交媒体的关口前移。具体而言,根据社交媒体谣言的演化机理和传播逻辑,埃塞政府相关部门可建立谣言敏感词语数据库,利用当下成熟的大数据技术,实时监测易造谣易传谣的社交媒体账号,追踪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在谣言制造之初、负面影响力未形成之前,就果断删除相关不实信息,最大限度地阻断谣言传播过程,可有效消减其对国家政治治理有效性的影响。以新技术引领治理思维的转变、创新治理方式,将是埃塞政府突破社交媒体治理困境的一条切实可行之路。

对埃塞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来说,促进民族整合和应对民族冲突是政府推进民族治理体系建设形影相随的两个方面,而当前这两方面都受到社交媒体的影响。社交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埃塞各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增强,但更成为族际冲突与民族国家矛盾的集中爆发地。特别是当前提格雷冲突仍在持续,阿姆哈拉族、奥罗莫族、提格雷族三大民族都卷入其中,而

^① Markos Berhanu, “The Fading Press”, *Ethiosports*, <https://www.ethiosports.com/2017/05/13/the-fading-press>, 2017-05-14.

原本未卷入提格雷之战的阿法尔人也正在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埃塞整个国家处于撕裂之中。随着现实冲突的扩大演变为一场残酷血腥的战争，社交媒体的仇恨言论也以惊人的速度增加，甚至有关消灭某个族群的讨论也已经正常化。在脸书上拥有 350 万粉丝的阿比总理曾在 2021 年 10 月 31 日发帖，呼吁埃塞人利用“任何可能的武器……来击退、推翻和埋葬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他还强调“为了埃塞俄比亚而死，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几天后，该帖子因违反平台煽动暴力的政策而被脸书删帖。^①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也称埃塞和更广泛地区的稳定处于危险之中，呼吁不要煽动仇恨言论、暴力和分裂。^② 当前，各方对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在提格雷冲突乃至埃塞民族政治关系中产生了何种影响，线上仇恨言论与虚假言论如何加剧了埃塞族际紧张局势与线下暴力，对上述问题展开独立的调查评估等相关反思开始愈发增多。^③ 因此，加强对社交媒体在埃塞民族政治中的使用与影响研究正当其时，埃塞所面临的社交媒体治理困境也能给其他多民族国家予以启示与思考。从理论上讲，社交媒体所代表的新技术对时间进程的压缩和空间结构的整合创造出一个多时态共存的虚拟空间，不同民族之间的交互关系由以“我”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扩展为不同虚拟社区“我们”与“他们”的交流互动，这一交互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人类学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再思考与再建构。在这一过程中，新技术的力量有望通过合理的制度规制和舆论引导，推动埃塞各民族聚集在网络虚拟空间通过对话减少相互仇视的言论，助力消除现实中的暴力冲突。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

① The National, “Facebook Deletes Ethiopia PM’s Post Telling Citizens of ‘Obligation to Die’”, <https://www.thenationalnews.com/world/africa/2021/11/04/facebook-deletes-ethiopia-pms-post-telling-citizens-of-obligation-to-die>, 2021-12-06.

② The Security Council, “Deeply Concerned” over the Expanding Conflict in Northern Ethiopia – global Issues, <https://dtqzy.com/wp/the-security-council-deeply-concerned-over-the-expanding-conflict-in-northern-ethiopia-global-issues>, 2021-12-06.

③ Peter Mwai, “Ethiopia’s Tigray Conflict: What Are Facebook and Twitter Doing about Hate Speech?”, *BBC*, [tps://www.bbc.com/news/59251942](https://www.bbc.com/news/59251942), 2021-12-07; Center for Advancement of Rights and Democracy, “Social Media Situation Report on the Conflict in Tigray. Covering Period – February 1 – March 31, 2021”, 2021-12-07.